

脚踏实地 勇攀高峰

——董玉琛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体会与感悟

■谭光万

2013年7月,刚刚走出校园的我,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一头扎入董玉琛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中。从开始对董院士的一无所知,到逐渐了解,并深深地折服与敬仰;从最初的紧张不安,挫折时的焦虑,到最后的感动与感恩,回首采集历程,收获颇丰。

团队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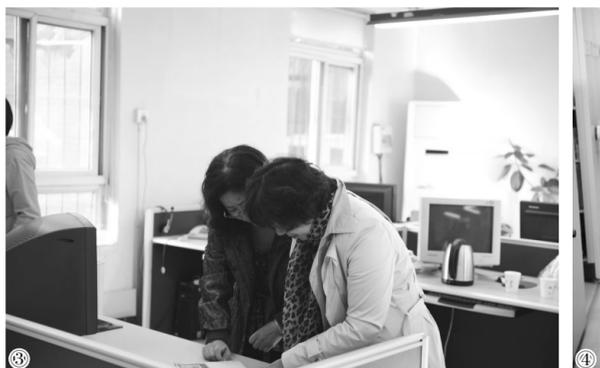
董玉琛院士已于2011年仙逝,我从未见过董院士,对董院士知之甚少。当听到将由我主笔撰写研究报告时,我深感不安。幸好采集小组中有董院士的家属、学生和同事,他们对董院士生前的工作很熟悉,而且对董院士感情深厚。不论是在小组会议讨论中,还是在采集过程中,我都能体会到他们对董玉琛院士的敬仰与缅怀。研究报告初稿完成后,采集小组的各位老师分别审阅不同章节内容,并提出修改意见,使得研究报告不断完善。至董院士学术传记正式出版前,我已将其改过近20次。突然想起,董院士的一位学生告诉我,董院士曾将他的一篇文章改了13次。当时惊叹董院士对学生之严格,科学研究之严谨。这种严谨的学风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感染了我们。而在采集工作遇到困难时,采集小组的各位老师总是能给我以强大的支持与鼓励,这是采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较好完成的关键因素之一。

由易入难

董院士出生在河北高阳县,后考入北京大学并参加革命,曾奔赴张家口解放区,在组织安排下考入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今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曾在苏联哈尔科夫农学院留学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作物种质资源工作。董院士的经历相对较简单,工作后一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因此她工作后的相关资料保存比较完整。但是在学术成长时期,她先后在高阳、北京、保定上学,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她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的资料采集存在一定困难,我们采取从易到难的策略,先去河北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采集董院士大学时期的相关资料。在河北农业大学,我们很幸运地采集到了董院士的大学毕业证书、成绩单和毕业照片等关键资料,我们还在河北农业大学访谈到了董院士的大学英语老师,年届百岁的桓桓武教授,了解到董院士在河北农业大学的学习情况。在河北农业大学农学院,董院士系统学习了农业科学知识,为她此后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采集过程中,我们正是采用由易入难的策略,通过容易采集到的资料,进而拓展,发现了和采集到更多的资料。

抓住关键线索

董院士是先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后转入农学院,是什么促使她转换了专业呢?我对此疑惑不解。在阅读董院士人事档案时,我发现董院士是在北京大学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在她的党员登记表中,对此有相关的表述,并记载有两位入党介绍人。通过这一关键线索,



①2013年10月14日,采集小组在北京访谈何钊时的合影,前排左一何钊、左二何钊女儿。
②2013年10月15日,采集小组在河北农业大学访谈百岁的桓桓武教授(左)。
③2013年10月15日,采集小组在河北农业大学档案馆查阅资料。
④2013年12月5日,采集小组在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

我们尝试着去寻找董院士的入党介绍人,发现其中一位入党介绍人——何钊女士还在世。我们便联系何钊女士进行了访谈。何钊女士不仅是董院士的入党介绍人,还是董院士北师大附中的同学,曾在北京大学与董院士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奔赴张家口解放区。通过访谈何钊女士,结合董院士档案里的记载,我们确定了董院士在北京大学由医学院转到农学院的原因是当时革命的需要和学习兴趣的改变。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北师大附中的相关情况,以及董院士在北京大学开展的革命工作、奔赴张家口解放区的过程,可谓收获满满。

坚持有惊喜

在资料采集和报告撰写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董院士留学苏联时期的资料匮乏。我反复查阅董院士的人事档案,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但只找到了她出国前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的资料。我又到国家图书馆、国家农业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和期刊数据库,希望能从中收录有董院士回忆苏联留学经历的文章,但均无所获。同时,我又请采集小组其他老师帮忙询问是否还有与董院士一起去苏联留学的专家在世。在四处搜集均未果的情况下,我想起在董院士办公室还有部分零碎的纸张资料未经整理,于是就抱着迟早要整理的心态,去整理这部分资料。在整理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了董院士写在一张面试人员名单A4纸背面的一段文字,其中居然记

录的是她在苏联留学时期撰写毕业论文的经过,而且记载了她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留学生的过程。这一发现,让我欣喜若狂。冷静下来后,我进一步分析,董院士写了留苏时期的这个回忆手稿,很有可能曾发表过相关的文章。于是我转换思路,用“留学苏联”“留苏”等关键词再次进入期刊数据库检索,果然,我检索到了董院士发表在《农业科学通讯》1959年第19期的《留苏归来》一文,里面更为详细地记载了她在留苏期间与导师的交往、开展实验遇到的问题等重要事件。随后,我又在中国工程院网站找到董院士写的院士自述,其中不仅回忆了在苏联的留学经历,还写下了苏联留学及在瓦维诺夫全苏植物栽培研究所进修的经历对她此后学术生涯的重要影响。采集到这些资料,让我们逐渐了解了董院士在苏联留学的情况。此外,我们还获知董院士的丈夫胡含先生,曾和董院士一起在苏联学习。我们通过访谈胡含先生,不仅印证了很多关键事实,还获得了更多董院士在苏联留学时的生动事例。此后我们逐渐采集到了董院士在苏联留学时的试验记录本、照片等珍贵资料。这一时期的资料逐渐丰富起来,研究报告的相关章节也顺利完成。我们的坚持不懈,获得了可喜的回报。

感动与感恩

在采集资料 and 研究报告的写作过程中,

虽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但是董院士留下的正能量一直激励着我。每当采集工作进展缓慢时,我会想起董院士曾手书的治学格言“循序渐进,勇于创新”;每当资料搜集遇到困难时,我会想起董院士不畏艰险,年近六十还带队野外考察的事迹;每当苦于资料的缺乏而难以推进报告的写作时,我会想到董院士50余年如一日坚守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事业上,持之以恒,不懈追求的精神。

在我们的口述访谈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曾与董院士工作过、交往过的人们,对董院士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人格品质的由衷赞赏与敬仰。他们讲述的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让我备受感动。从事董院士的采集工程,无疑让我经历了一场科学精神的洗礼。其实,采集工作本身就是在传承和弘扬科学精神。

采集工作的顺利完成,是采集小组所有成员共同努力的成果。当然离不开董院士亲属、朋友和同事的支持,也离不开董院士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单位的帮助,感恩所有在采集过程中给我们帮助和支持的人们!

董玉琛院士曾把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的体会总结为“脚踏实地,勇攀高峰”。当采集工作完成后,我最大的感悟亦莫过于此。希望所有脚踏实地参与采集工程的人,都成为科学精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勇攀科学高峰!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师恩情似海 风范照我行

——缅怀董玉琛先生

■仲远

董玉琛先生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作为学生的我,每每想起,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回想当年我在北京跟随董先生读研究生时的求学生活,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如仍在眼前。

我是1981年底考取中国农业科学院董玉琛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初到北京,一切都显得陌生,要见董先生时,心里特别紧张。没想到一见面,董老师一句“小仲”的亲切称呼,顿时让我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下来,令我倍感亲切。记得当时董先生笑着问我:“你为什么选报我的研究生?”老师这么一问,我立刻变得轻松欢快起来。我告诉老师,自己是通过查资料发现老师是《作物学报》编委、品种资源研究所的领导,并且是留苏的研究生,由此推断老师一定很厉害,便决定报考董先生的研究生,冒险碰碰运气。老师听了我的话大笑起来,开心地道:“你这个小孩呀!”

董先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之一。我有幸在1982年跟随董先生一行到新疆对新疆小麦野生近缘植物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考察与研究。我们收集了许多小麦野生近缘植物,在董先生指导下,首次在国内建立了小麦野生近缘植物资源圃,并对这些资源进行了表型、核型和亲缘关系的研究。我们还作了许多远缘杂交进行野生近缘植物利用的研究,包括小麦与大穗草和新麦草杂交。很多工作在当时是开创性的。那时考察条件十分艰苦,常常是跋山涉水,出没于荒野沙漠中,食宿条件都很差。那段时间不管多苦多累,董先生都要写日记记下当天的事,工作尽心尽力,一丝不苟。每到一处,都与当地维吾尔族、汉族人员亲切交谈。董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尊重当地民风,与大家合作愉快。先生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董先生在培养学生方面可谓呕心沥血。1984年,在犹他州美国农业部工作的杜威博士应邀来品资所讲学。董先生争取每一个机会让我们参与杜威博士的学术交流。虽然我们当时英语水平有限,她仍然放手让我们翻译供培训使用的杜威博士的教案文稿,并鼓励我们多用口语交流,还为此组织了数次与杜威博士的座谈会。我们当时很受鼓舞。之后,董先生说服所里把翻译稿费发给我们。虽然钱不多,但对当时捉襟见肘的学生们来说,感觉是发了一笔小财。

董先生总是把成绩和机会让给学生。我们新疆考察后,董先生牵头与合作单位共同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了《新疆大穗草的考察与研究》论文。后来,她坚持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上。当时,还是我在校稿时才又把董先生的名字放在了前面。在20世纪80年代董先生就能有这样的胸襟,把成绩、机会让给学生,力推学生,真的是难能可贵。

在生活上,董先生对学生也是关心备至,视我们为己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元旦,董先生约我和刘旭、许树军(好像还有钱勇)几个没有成家的学生到她家吃涮羊肉。那时条件远没有现在好,对我们这些天天吃食堂的学生来说,能放开肚子吃一顿涮羊肉,确实是难以形容的享受和兴奋。董先生的饭菜格外可口,她不断给我们夹肉,总想让我们多吃些。她哪里想到我们这几个年轻人这么能吃,把她准备的几斤羊肉一扫而光。董先生马上请阿姨到楼下又买了些羊肉,还不断让我们多吃。那温馨的家的感觉,令我们这些远离故乡的学子终身难忘。

也许是上天赐给我幸运,我很荣幸地成了董先生的学生,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董先生对我关怀备至。每年放假,董先生总是关切地问我一些我的家庭情况,我也会带一些家乡的黄花草和馓子给她。虽然这些东西很普通,她却很是开心。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她年事很高的时候,我回所看望她老人家,她仍不顾年迈,与我谈科研,陪我吃饭,还要亲自带我去看鸟巢、水立方。在我一再坚持下,她才没去。我从心底深深地感到先生的那份厚爱!

如今先生已去,回想起先生对我的辛勤栽培,思绪万千。先生对我的恩德我将铭记在心,先生的学术风范我将视为事业标杆,先生的高风亮节将照亮我前行!

(作者单位: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署)

小事见真情 细节现风范

——记我与导师董玉琛先生的几件小事

■刘旭

敬爱的董玉琛先生是我的硕士与博士导师,受她教诲,在她身边工作整整三十年,是她把我带入了作物种质资源的殿堂,使我从一个不知道什么是种质资源的学生,成长为一个学者。导师对我的教诲与影响是难以用语言与文字来表述的,写下这段文字只是通过我与导师的几件小事,来见证董玉琛先生的培养之情与大师风范,同时缅怀我敬爱的导师董玉琛先生。

(一)初次拜见

我于1980年9月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师从戴松恩先生。入学后赴南京农业大学学习基础课一年,于1981年8月回到北京进入实验室学习。当我向戴松恩先生汇报硕士论文实验计划时,他告诉我找一下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所的董玉琛先生,要一些当年秋天在温室种植的实验材料,并告诉我他已与董先生讲过此事。于是,第二天我忐忑不安地去见董先生。当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她微笑着与我打招呼,使我紧张的心情稍有松弛。我把导师的意见与我的想法简单地汇报了一下,董先生马上说她已知道此事,并为我准备好了要种的小麦材料,还交代了注意事项,临走前还特意嘱咐我有事随时可以找

她,不要客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董先生,她的慈祥、谈吐、热情、睿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我终生难忘。

(二)发表译文

1994年我有幸成为董玉琛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虽然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时,由于导师戴松恩先生患病,董先生实际指导我,但能真正成为她的博士研究生,我还是由衷高兴。董先生为了让我专心科研,推荐我去美国开展合作研究。1996年10月我以高访学者身份赴美国开展研究,我向美方导师瑞瑞教授详细汇报了董先生的设想与我的研究计划,汪先生让我先查一些资料,然后种植一些实验材料。在我查找文献时发现了一篇有关RAPD技术在种质资源应用的最新文章,我想国内可能也需要这篇文章,就利用一个周末把它译成中文,然后寄给导师董玉琛先生,希望供实验室参考,同时提出如认为有必要也可以译文形式发表。此事办完后,我便投入到紧张的实验工作中。我1997年6月回国后发现,董老师认真地把我译文进行了审校后,投到了《生物技术通报》,并得以正式发表,而译者仅有我一个人,使我再一次见证了长辈学者对年轻后生的关爱与大师风范。

(三)促膝长谈

在董玉琛先生的关心与大力举荐下,我于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知道凭我的能力与水平实难名副其实,之所以当选主要是董先生的支持和种质资源队伍的托举。我只有努力工作,为种质资源事业贡献自己全部身心来报答导师与大家的厚爱。至于如何去做,自己却还是比较模糊的,而此时董玉琛先生又一次为我指点迷津。2011年6月,中国工程院召开院士大会,在院士会议期间,董先生专门找我长谈一次,主要讲述了她对作物种质资源与国家粮食安全的关注与设想,希望我能接过重任,与大家一起推进全国种质资源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并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战略性建议。这次长谈,为我在今后一段时间的科研定位及战略构想奠定了坚实基础。可是这次长谈三个月后,董先生便因病突然仙逝,她对我未来的指点与嘱托,成为了我希望我完成她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遗言。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团结全国种质资源科技工作者,把我国种质资源事业推向一个新阶段,绝不辜负导师的厚爱与期望。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①1984年,董玉琛(右二)参加中国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奠基典礼。②1986年,董玉琛(右)在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考察。③2010年,董玉琛(右)与学生仲远合影。④2011年,董玉琛(左)与学生刘旭讨论作物种质资源工作。

勘误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杨叔子院士采集小组2018年8月20日在《中国科学报》8版刊登的《于采集中升华境界——杨叔子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采集心得》一文中,“1988级博士研究生、现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史铁林教授”应为“1988级博士研究生、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史铁林教授”;“院士的1995级博士研究生、现北京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张海波”应为“院士的1995级博士研究生、现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海波”。

特此更正并致歉!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杨叔子院士采集小组
2018年8月24日